

走過三世紀的老牌女青運動

文 | 顧燕翎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兼任教授

從臺北市青島西路大門走進女青年會，在等電梯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塊長方形透明壓克力的女性文化地標，上面寫著女青年會是一個國際性、宗教性、服務性的團體，這是中華民國文化復興委員會（現名為中華文化總會）在 2007 年選擇臺北市女性地標時，給女青年會的定位，當時我也參與其中。這不僅是女青年會深烙人心的印象，也是資深會員們定位自己的方式。

2012 年，在侯天儀會長亟思重塑女青形象的感召下，我成為臺北市女青年會的董事，開始接觸到世界女青年會的願景、目標、策略和歷史，好像挖寶一樣，發現一個我從未認識的婦女運動。原來一百五十多年前初具雛形時，女青年會就自許為婦女運動和青年運動，之後也始終自稱 YWCA movement，女青運動。我們在臺灣一直用女青年會的稱呼，把它看做一個機構，世界女青年會卻以「運動」二字標舉行動性，不知不覺中流露出文化差異。

女青年會的成立是為了年輕女工。工

業革命後，一波接一波的年輕女性從鄉村湧入城市謀生，工作環境惡劣，又漂泊不定。看在歐美中產階級基督徒女性的眼裡，開始帶領祈禱及提供住所，雖然自稱為運動團體，但近似於公益或慈善性質，而被歸為社會服務團體。然而剝開歷史表象，可以深一層看到，女青運動雖不高呼男女平等，它的足跡卻處處和婦女運動交疊，在實際行動上甚至有時超前於婦運。

人的生命如潮水，有起有落，從出生、成長，走向興盛和凋零，社會運動亦有生命週期，發端、集結、制度化，爾後削弱、消失，19 世紀以來，在歷史江河中，多少社會運動潮起潮落，煙消雲散，女青運動卻始終茁壯，展現女性跨越時空、綿延不斷的生命力。

翻開婦女史，女性之間相互取暖，餘溫猶存。第一次國際婦女會議早在 1878 年於巴黎召開（那時候所謂的國際可能還只是歐洲），當時法國國勢正隆，在國際上居於領導地位。第二次國際婦女會議是 1888 年國際婦女理事會（ICW,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在華盛頓

召開，女青年會的第一次世界婦女會議則是 1898 年在倫敦召開。這些會議都在正式的、政府支持的國際聯盟成立之前¹，不僅婦女們飄洋過海、進行結盟跟會議，還於日後催生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些生機蓬勃的女子究竟來自何方？

18、19 世紀，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很少，工作機會更少，上流社會把女人養在家裡，也關在家裡，拋頭露面外出工作是不光彩的事。這些投入女青運動的女性都受過高等教育、出身高尚家庭，充滿熱情、願意服務奉獻，卻沒有符合身分的工作機會。她們以宗教熱情投入慈善活動，比較不引人側目。所以女青運動吸收了大批優秀志工，在全球發光發熱，創造了婦運傳奇。她們也透過跨文化的連結，手牽著手、一代一代走下去。1945 年聯合國成立，會員國表決設立人權委員會，但僅有的四位女性代表卻堅持要有一個獨

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申張婦女權利，四位代表中有一位是中華民國的吳貽芳。之後聯合國成為婦運的重要舞台，女青年會也是其中的關鍵角色。

在男權社會裡，弱勢團體要爭取權利，總會弄得頭破血流，付出慘烈代價。但是女青運動的領導者卻主動分享權利，身體力行女性主義的平等、尊重。爬梳女性主義理論，去殖民化的主張出現在 1990 年代，是第三世界女性對主流文化的批判。可是女青年會內部很早就開始去殖民化，廣納各色人種和年輕女性，避免變成白髮白女人的地盤。

1938 年世界女青大會後，第二次大戰爆發，中間停辦了近十年，1947 年決定在杭州召開世界女青大會，各國派代表參加。中國剛經過八年抗戰，正在國共內戰，動盪不安，可是世界女青年會堅持在歐美地區以外舉辦大會，減少白人主導的色彩，宣示種族融合。中國與日本剛打完仗，她們也有意藉此推動國際和平，扶日本一把。那時候辦世界大會難度很高，最快的聯絡方式就是寫航空信，至少要一週才會送達，但她們願意克服萬難。當時提出來“enable women”的口號，1990 年代以後“empower women”是全球婦運的重點，二者意思相近，都是讓女性發揮能量，參與社會。

此後，原先皆是殖民地的印度、錫蘭（斯里蘭卡）、緬甸等等，開始培養在地的婦女領袖，臺灣的第一屆會長就不是西



五〇年代臺北 YWCA 徵募會員運動，當時已非常國際化。

¹ 國際聯盟於 1920 年 1 月 10 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生效時成立，目的為避免世界大戰再度發生；凡是在大戰中對同盟國宣戰的國家和新成立的國家都是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

方白人，但是其他地區的女青年會則幾乎都是由白人傳教士開創，爾後才訓練當地婦女擔任領導。印度等亞洲國家成功的經驗，也被複製到非洲，並且由亞洲女性擔綱國際訓練工作。女青年會始終堅定對抗種族歧視。

世界女青年會在本身的組織裡也做到去殖民化，日內瓦總部的工作同仁來自各



五〇年代臺北 YWCA 即設立牛奶站，提供物資。

國的不同人種，五位副會長，必須來自五個不同的洲。這樣做需要付出龐大行政成本，例如增加語文的困難，大家都在用非母語溝通，要克服不同的思考邏輯。地方女青年會則努力增強在地文化的信心；1956 年，印度在孟買舉行全國大會，來參加的女性都沒有戴帽子，這實在意義重大。女青年會從英國發源，女王、上流社會女性出門都要戴上漂亮的帽子，顯示身份、氣派，殖民地也跟著仿倣，但是女青年會讓大家了解在地文化的尊嚴，所以那次會議之後，大家都把帽子收起來，不再戴了，省了一筆帽子的花費。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南非，重要聚會的時候，會員都穿戴整齊並且戴上帽子，有一位成員說她參加女青年會的目的就是要丈夫給她買

漂亮的帽子，因為這是上流社會的聚會。後來一位會長告訴會員：妳們坐火車去開會，大包小包還要帶著帽子盒，很不方便，教她們如何輕裝上路，增加機動性，也因而轉變了殖民文化。

幾乎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難民營，所有受苦難的地方，都有女青年會的事工，這不但難度高，還要做出道德的選擇、克服許多危險，譬如選擇幫助巴勒斯坦難民，會招致以色列不滿；在曾經長久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黑人與白人不能住在同一區域，不能上同一所學校，不能進同一家戲院，但是南非女青年會在 1950 年代就黑白同會，為了做到這點，必須克服晚上的宵禁，她們常在晚上穿越封鎖線，開很遠的車，回到居住地，以行動反抗種族隔離政策。

從很早開始，女青年會就不只服務，也開發女性的力量，運動與組織經營並重，這點有別於其他運動團體，相當特殊。女青運動除了運動理念，也強調財務管理、責任的重要，以及管理的效能。有效治理是現代管理的重要理念，所以女青年會不單是運動團體，也是一個有效的管理體系，強調自給自足。我們常說給人魚吃不如教她釣魚，但女青運動並不停留在教人釣魚而已，還要挖魚池、開發魚源，和分配魚獲。烏干達的女青年會有一個「小牛計畫」，她們去荷蘭參訪，看到荷蘭養了過多的牛，必須要殺掉，太可惜了。因此和美國談，運送 50 隻小牛到烏干達，分給每家一頭牛飼養，條件則是生下來的第一隻小母牛一定要送人，不能自己留著，牛奶不只自己喝，還可以賣給鄰居，並將牛糞做成燃料，和鄰居分享。



六〇年代臺北YWCA成立鄰里母姊會服務清寒家庭，扮演重要服務社會的角色。



1977年YWCA世界協會會長訪臺，由臺北YWCA辜嚴倬雲會長接待。

女青的宣示中，經常強調尊重差異。早期女性主義強調相同性，女性與男性相同，所以應當平等。人的差異性被看見，而且受到尊重，是在後現代、後殖民時期，也就是20世紀末。但女青年會在二次大戰後，就已尊重差異，憲章的改寫是將世界各地的想法匯聚起來，由下往上推動改變。近年來受到生態女性主義影響，尊重人之外，也尊重地球上不同的物種，維持永續共生的環境。

可惜女青年會的工作重點放在實踐和服務，在女性主義風起雲湧的年代沒有參與理論的論戰，也沒有發展自己的論述，以致被歸類於婦女運動之外，甚至本身女

性的立場也幾乎動搖，而一度迫於生存發展的需求，考慮與男青年會合併。1970年代第二波全球婦運的及時出現和女性主義的興起，讓女性立場重新得到正當性，女青運動也終於站立自己的腳跟上，搖搖晃晃走過20世紀，邁入了21世紀。

新世紀的女青發展更穩健，改造父權文化的目標也更明確；目前女青全球會員超過三百萬，在兩萬多個社區都有草根據點，是國際社會活躍的領導者，也用心耕耘基層、培養年輕女性、防治愛滋與性別暴力，在所有重要職位上保留四分之一給三十歲以下的年輕女性，栽培未來的領導人才。世界女青年會的會長、祕書長經常由非洲女性出任，澳洲女青年會近年來也產生了第一位原住民會長，在在展現了女人當家特有的前瞻與包容，也讓我們對女性主義所追求的平等、分享、互相尊重的人類社會更具信心。



2004年全球YWCA年輕女性論壇在臺北舉行，來自世界各國的女性踴躍交流、互相分享。